

# 明代庶民婚礼服中的“假用”与“盛服”

苏文灏, 张玲\*

(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 北京 100024)

**摘要:**为厘清明代文献记载与后世认知在庶民婚礼服上的差异,通过考辨“假用”与“盛服”的语义内涵,结合历史维度、服饰制度、社会文化及婚俗传统,采用图像、文本、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还原明代庶民婚礼服的真实样态。研究表明:明代庶民与品官的婚礼服仍存在显著差异——所谓“假用”品官服饰仅适用于官员子孙婚礼,而明典规定的庶民婚服实为超越常服形制的“盛服”。有观点基于“吉日”特殊场景认定庶民婚礼可僭越服饰制度,这一结论存在理想化倾向。此外,清廷出于政治考量将明代“品级之服”下放为“汉民婚服”,是造成后世误读明代庶民婚礼服的另一关键因素。

**关键词:**明代;婚礼服饰;“假用”与“盛服”;服饰制度

**中图分类号:**J 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5)02-0152-07

## "Borrowed Usage" and "Ceremonial Dress" in Commoners' Wedding Clothing of Ming Dynasty

SU Wenhao, ZHANG Ling\*

(School of Theater, Film and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To clarify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Ming Dynasty documentary records and later interpretations of commoners' wedding attir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semantic connotations of "borrowed usage" and "ceremonial dress" through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sociocultural, and ritual perspectives, employ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y that integrates visual analysis, textual sources, and material artifact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ersisted between commoners' and ranked officials' wedding attire during the Ming period: the so-called "borrowed usage" of official garments was restricted to weddings of officials' descendants, while the legally prescribed commoners' wedding attire constituted "ceremonial dress" that transcended daily clothing norms. The assertion that commoners could temporarily violate sumptuary laws during "auspicious occasions" exhibits idealization tendencies. Furthermore, the Qing court's politically motivated redesignation of Ming "rank-specific garments" as "Han wedding attire" emerged as a critical factor in later misinterpretations of Ming commoners' wedding practice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wedding clothing, "borrowed usage" and "ceremonial dress", clothing norm

明洪武元年,朝廷颁布涵盖天子纳后至庶民婚仪的着装规范,并载入《大明集礼》《大明会典》等后世典籍。相较于皇室婚礼服饰的详尽记载,庶民婚服仅以笼统名词表述,这成为学界对明代婚礼服饰制度产生争议与误解的重要原因。

梳理明代庶民婚礼服饰研究成果,多数学者倾

向以“新妇身着大红大袖衫、凤冠霞帔,夫婿头戴乌纱帽、身着大红圆领袍”为婚礼服饰范本<sup>[1-8]</sup>。部分学者以“明初规定至实际生活鲜用”为依据支持该论点<sup>[2]</sup>,另有观点认为明代确立了新娘戴凤冠、穿霞帔、盖头巾的婚俗,并因“尚赤”传统形成男女皆着红色礼服的制度<sup>[9-12]</sup>。然而,这些推论普遍缺乏

收稿日期:2024-11-06; 修订日期:2025-0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19BG105)。

作者简介:苏文灏(1988—),男,讲师,博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张玲(1972—),女,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服饰文化。Email:zhling0302@126.com

系统的社会学与制度史论证支撑,部分观点存在逻辑断裂。学界对皇室贵族、品官与庶民婚礼服饰差异的阐释存在概念混淆现象。文中立足明代语境,在庶民婚礼制度框架内考证服饰名目的实际所指,结合明代服饰实物、典籍记载、传世画作及小说文本,力求还原明代庶民婚礼服饰的真实样态。

## 1 明代男性庶民婚礼服饰“假用”考释

明代典籍在“亲迎”“见舅姑”“见祖祢”“见妇之父母”等婚礼环节记载了着装要求,规定男性庶民在上述环节着盛服。其中《明会典》载:“品官子孙假九品服,余皂衫折上巾。”<sup>[13]</sup>《大明集礼》与《明史·舆服志》则载:“婿常服,或假九品服。”<sup>[14-15]</sup>这些记载在适用对象与服饰形制方面存在表述模糊。

### 1.1 “假用”之意

《明会典》载明代品官婚服,即:“壻具公服亲迎”。而《大明集礼》则明示:“品官婚礼各用本职朝服……其三品以上子婚假五品服,五品以上子假七品服,六品以下子假八品服”<sup>[16]</sup>。两处记载虽用公服与朝服不同名称示人,但《大明集礼》所述的朝服实则为公服。明洪武时规定:“在京文武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见辞则服公服。在外文武官,每日清早公座亦服之。文武官公服用盘领右衽袍,八品九品,绿袍。八品以下无纹,幘头用展角”;明代官员的朝服则穿用在大祀、庆成、冬至等国家重大仪式之中,官员戴梁冠、着赤罗衣<sup>[14]</sup>。明代文武官礼服分为公服、朝服、祭服3类,分别用于不同场合。其中朝服具有最高礼制属性,显然不适用于官员婚礼。《大明集礼》所提到的“朝”应指“朝事”所着之服即公服,并非由梁冠、赤罗衣组成的“朝服”;而部分学者推论明代婚礼服饰“尚赤”也与误读此处信息,将官员朝服赤罗衣视为官员婚服有关。此外,《明太祖实录》载:“明太祖谕令礼部大臣曰‘古代士大夫其见私亲尊长亦必有公服’”<sup>[17]</sup>。由此可见,公服符合品官及子孙在婚礼诸环节的着装要求。

品官子孙婚礼服采用“假用”制度,其适用范围为六品以下官员子孙,允许假用八品服;六品以上官员子孙假用品级低于其父辈两级。这种“假用”并非服饰等级逾制的表现,而是为未获实职的官员后裔制定合法的婚礼礼服标准。

《大明集礼》与《明会典》对庶民婚礼制度的记载均标注为洪武三年(1370年)定,但《明会典》成书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并经万历重修,部分内容已更新<sup>[16,18]</sup>。因八、九品公服形制差异细微,《明会

典》“品官子孙假九品服”的规定实为《大明集礼》中六品以下官员子孙婚服要求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大明集礼》将“庶民,婿常服或假九品服”并列记载,模糊了低级官员子孙与普通庶民的身份界限,未能如《明会典》般清晰界定两者的婚服差异。

### 1.2 “小登科”与男性庶民婚服

有学者认为男子娶妻俗称“小登科”,因此可穿九品官服<sup>[10]</sup>。此说法忽略了“大登科”与“小登科”之间存在的理想化与礼制化差异及关联。“大登科”即科举登第,成熟于唐代的科举制度至明代得到高度重视,明廷认为“设科取士为致治之本”,并逐步完善乡试、会试、殿试等环节<sup>[19-20]</sup>。科举登第服饰象征着寒窗苦读的成功,洪武初年规定了进士与状元冠服,即:“进士巾如今乌纱帽之制、展角、系以垂带,深色蓝罗袍、缘以青罗,廷试后付国子监领出,传胪日服之。至上表谢恩后,谒先师孔子行释菜礼毕,始易常服,其中袍仍送国子监交收。状元冠服,朝冠二梁,圆领朝服绯罗为之,白绢中单,锦绶、蔽膝全。纱帽一顶,朝靴、毡袜各一双,俱内府制造。礼部官引至御前颁赐,上表谢恩日服之。”<sup>[19-21]</sup>

进士服的乌纱帽与深蓝罗袍,在首服形制与袍衫色彩上均与九品官员公服存在显著差异。明万历余士、吴钺绘制的图册《徐显卿宦迹图·琼林登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可见相关形制(见图1)。状元冠服虽与品官朝服形制相近,但品级的差异及使用场合的不同,状元冠服难以视为男子婚礼可“假用”的九品官服;而因其绯色特征,反而成为过往学者误推明代婚礼“尚赤”的另一依据。



图1 故宫博物院藏《徐显卿宦迹图》局部

Fig. 1 Partial view of Xu Xianqing's Official Career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小登科”文化隐喻的形成,与明清小说中“科举式订婚”情节的建构密切相关。在科举制度高度成熟的明代,通俗小说常将科举功名作为婚姻关系的核心纽带:科举既可能成为婚姻缔结的阻碍,如《警世通言·陈可常端阳仙化》中科举失利导致婚变;也可能成为促成因素,如《醒世恒言·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科举成功促成良缘。这种叙事模式使科

举的成败直接影响婚姻结局,反映出明代社会将科举价值体系渗透至人生礼仪领域的文化特征。

将订婚喻为“小登科”并着状元服的艺术创作视角,符合明代大众“成家立业”的价值取向。但需注意:现实中新郎着状元服出现在婚礼仪式并无据可考,二者的关联是文学创作的艺术融合。清代民间汉族婚礼租赁“翰林院”仪仗与官衙仪礼道具的习俗,是导致后世将明清婚俗混同、误判明代婚服与状元服存在形制关联的重要原因。康熙末年昆山人章法《竹枝词·艳苏州》记载平民租借衙门行头、效仿“翰林院”仪仗的婚俗,清徐扬《姑苏繁华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亦可见手持“翰林院”“状元及第”牌的迎亲队伍<sup>[22]</sup>(见图 2)。这种文化误读反映了明清社会文化变迁中礼仪符号的挪用与重构现象。



图 2 辽宁省博物馆藏《姑苏繁华图》局部

Fig. 2 Partial view of *Prosperous Scenes of Gusu* from the Liaoning Provincial Museum collection

若假用九品服仅适用于低品官员子孙婚礼,那么典籍记载的“皂衫折上巾”是否即为男性庶民的婚礼“盛服”。明洪武三年(1370 年)定制庶民日常着装规范:男性“戴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并在服色、首服装饰等方面设定禁忌,严禁逾制<sup>[13]</sup>。相较常服,婚礼所着皂衫与折上巾在服制上已有显著调适。据传世实物分析(见图 3),庶民婚礼折上巾应为无饰乌纱翼善冠形制,皂衫服色倾向深青色,缘边接近青色,属正式礼服而非素服<sup>[23]</sup>。



图 3 “孔府旧藏”明代衍圣公的“皂罗衣”

Fig. 3 Ming-era “black silk robe” of the Duke Yansheng from the “Confucius Mansion archives”

此外,“披红”习俗是明代男性庶民婚礼的重要饰件,即肩部斜披红色锦缎一幅。尽管明代典籍未

明确记载此俗,但诸多明代小说中均有新郎披红的细节描写<sup>[7]</sup>,如《醒世姻缘传》第 76 回描述:“狄希陈公服乘马,簪花披红”;《古今小说》第 27 卷描述:“莫司户冠带齐整,帽插金花、身披红锦,跨着雕鞍骏马,两班鼓乐前导”。综合上述线索,折上巾、皂衫辅以“披红”构成明时男性庶民婚礼的“盛服”。

## 2 明代女性庶民婚礼“盛服”考辨

明代典籍对女性庶民婚礼服饰名目的记载概括且模糊。《明会典》仅在“见舅姑”“见祖祢”环节记载新妇着“盛服”<sup>[13]</sup>,《大明集礼》则载妇服花钗、大袖<sup>[14]</sup>。部分学者依据清嵇璜《续通典》<sup>[24]</sup>中“庶民婚嫁得假用九品服”的记载,结合明代九品命妇礼服规范,推断女性庶民婚服应为凤冠、霞帔搭配大袖衫。然而,民国徐珂《清稗类钞》<sup>[25]</sup>对明代婚服的记载存疑:“明时,皇妃常服花钗凤冠。其平民嫁女,亦有假用凤冠者,相传谓出于明初马后之特典。然《续通典》所载,则曰庶民婚嫁,但得假用九品服。妇服花钗大袖,所谓凤冠、霞帔,于典制实无明文也。”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等级制度极为严苛<sup>[26]</sup>,女性庶民婚礼着凤冠霞帔缺乏制度依据。清代推行汉族女性续着汉服政策后,凤冠霞帔逐渐降为普通婚服,这种制度变迁导致后人误判此制在明代已普及民间。这一现象的深层动因仍需结合明清的服饰政策进一步探讨。

### 2.1 凤冠与花钗

明代上至“皇帝纳后”,下至“品官婚礼”皆有较为详细的新妇着装要求,从不同阶层的婚礼首服及衣饰可感知鲜明的阶级差异,具体见表 1。

婚礼佩戴凤冠仅限于明廷公主以上的女性阶层,公主出嫁服翟冠(九翟四凤冠),而公主以下的外命妇阶层婚礼首服仅为花钗。凤冠作为礼服核心组成部分,是皇室贵族女性的符号象征。在明初“正纲常、明上下”<sup>[17]</sup>的礼制框架下,平民根本无法僭越使用凤冠;且现存六顶凤冠<sup>[27]</sup>均出自帝后、亲王夫妇墓葬,其他官员及士庶夫妻墓葬均未出土凤冠。制度等级与考古证据共同表明,品官及士庶婚礼新妇佩戴凤冠的现象并非真实历史。

通过分析明代女性首饰实物与文献记载中的“花钗”意象,可初步推断明代女性婚礼首服形制。据墓葬出土及传世文物释读<sup>[28]</sup>,明代女性首饰主要包括髻髻、簪、掩鬓、满冠、钗、顶簪、钿、耳环等类型。其中,髻髻是已婚妇女的主要首服<sup>[29]</sup>,《醒世姻缘传》中即有素姐出嫁时佩戴髻髻的细节描写<sup>[30]</sup>。结



合考古发现与文献互证,明代女性婚礼头饰应以髻髻为主体,搭配面花(正面)、掩鬓(两侧)、满冠(脑后)、顶簪(头顶)及耳环(耳部)<sup>[31]</sup>(见图 4)。

表 1 明代不同阶层婚礼新妇礼服制度明细  
Tab.1 Detailed regulations on bridal attire for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during Ming Dynasty

婚礼仪式	首服	服饰
皇帝纳后	皇后首饰九龙四凤冠,大小花各十二树,并两博鬓,宝钿十二	服用袼衣,皇后表谢服展衣,其受命妇朝贺、朝皇太后皆首饰、袼衣
皇太子纳妃	太子妃首饰九翟四凤冠,上饰翠翟九、金凤四,两博鬓,大珠花九树,小珠花如大珠花之树	服用翟衣
亲王纳妃	妃冠九翟四凤冠,冠花钗九树,两博鬓,九钿	服用翟衣
公主婚礼	九翟冠,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	大袖霞帔
品官婚礼	妇服花钿	翟衣,各随夫之本品服。其三品以上子婚,假五品服。五品以上子,假七品服。六品以下子,假八品服,女服同



图 4 义乌市博物馆藏《吴氏先祖容像》局部  
Fig.4 Partial view of Ancestor Portraits of the WU Family from the Yiwu Museum collection

北齐始创的花钗制度,在历史沿革中始终作为彰显等级差异<sup>[32]</sup>、象征服制规范的具象符号。《唐六典》明确记载:“花钗礼衣,庶民女嫁则服之。”<sup>[33]</sup>明初制定的皇后至内命妇礼服冠饰均包含花钗,通过数量差异区分等级。然而,明代典籍既未明确记载庶民婚礼女服花钗的具体数量,也未提及“假用”某等级命妇冠饰的相关规定。女性庶民婚礼所服花钗与命妇花钗是否属于同一形制体系,仍有待考证。

在学界花钗形制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学者扬眉剑舞<sup>[34]</sup>提出,花钗与普通钗饰(如金钗、玉钗)存在本质差异,其造型似步摇,由螺旋状花柄集束成“树”形,包含花芯、花蕊、花叶等部件,此观点较受学界认同。明代花钗已演变为珠花<sup>[13]</sup>,明定陵出土皇后凤冠及明代皇后御容像均可见此类饰件。值得注意的是,花钗在命妇冠服体系中是凤冠的固定配饰,但对于佩戴髻髻的庶民新妇而言,受工艺、时间、成本及身份限制,花钗难以直接用于装饰首服。出土实物中饰件多采用插入式固定方式(见图 5),笔者据此推断明代女性庶民婚礼所戴花钗应为金属花钗或花簪,此类首饰更契合庶民婚礼的实用性需求<sup>[35]</sup>。花钗在明代呈现双重属性:在命妇阶层象征等级秩序,在庶民中则成为婚俗符号。《中国衣冠大辞典》对花钗的解释亦印证此点,既作为“妇女首饰”存在,又具有“区分等级”的功能<sup>[36]</sup>。



(a) 南京江宁殷巷沐昌祚明墓出土 (b) 南京中华门外俞通源墓出土

图 5 金牡丹花头饰  
Fig.5 Gold peony headdress

2.2 “红衫霞帔”的僭越标尺

典籍仅提及的“大袖”记载,导致明代女性庶民婚礼礼衣形制研究存在信息缺失。有学者以大袖衫为线索追溯命妇礼服形制,推论士庶妇人婚礼所服大袖即九品命妇大袖衫,并因喜庆需求选用大红色霞帔,认为此类着装获得官方默许<sup>[1-6]</sup>。

然而考据显示,大袖衫霞帔属明代贵族女性专属礼服,命妇礼服制度有明确刊行规定<sup>[37]</sup>。同时《明会典》载洪武三年(1370 年)定制:“庶民妻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若庶民妻婚礼采用大红色大袖衫搭配霞帔,显然违背明廷服制。“红衫霞帔”是否存在制度默许的例外情况,尚需结合其他史料进一步考证。

明永乐时期(1403—1424 年)对后妃礼服与常服的改制,明确大袖衫霞帔为皇后、太子妃以下内命妇的礼服。永乐三年(1405 年)定制:皇后常服为黄色大衫、霞帔;皇太子妃常服及皇妃、皇嫔、亲王妃等内命妇礼服为大红色大袖衫、霞帔。其他内命妇冠服虽未在永乐时期调整,但洪武五年(1372 年)已明确其制:四品、五品命妇礼服为山松特髻配大

红色大袖衫；贵人参照三品命妇，以皇妃燕居冠及大衫霞帔为礼服<sup>[13]</sup>。可见，大红色大衫、霞帔是明代命妇阶层的核心礼服，士庶女性无权使用此类衣饰。

根据前述学者观点，庶民婚礼新妇若“假用”末品命妇礼服的大红色大袖衫霞帔，显然违反明初服制禁忌。然而明代小说中多次出现新妇着大红礼服的描写：《醒世姻缘传》第 44 回载素姐“穿着大红装花吉服、官绿装花绣裙”<sup>[30]</sup>；《金瓶梅》第 91 回述玉楼“身穿大红通袖袍”<sup>[38]</sup>。这些描写显示新娘所着红色礼服形制多样（袄、袍），且均未提及霞帔。即使在纳妾或平民婚礼场景中，《金瓶梅词话》也仅描述新娘着“红衣”“红服”。

尽管明代小说存在艺术夸张或简略描写，但其对婚礼服饰的记录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明代女性庶民婚礼服饰并非参用品官命妇制度，而是依据“花钗大袖”的规定进行装扮。新妇所着红色“大袖衫”实为形制简化的大袖衣，与命妇礼服中的“大袖衫”存在本质差异，且不搭配霞帔。部分富贾、望族或在明廷婚礼服制未明确限制的领域（如服色、配饰）进行有限僭越，但仍未突破庶民冠服礼制的基本框架；多数女性庶民则因社会地位限制，仅能在婚礼时穿着红色吉服。

### 3 庶民婚礼用服的明清之别

清代《续通典》《明史·舆服志》对明代庶民婚礼的记载沿用《大明集礼》旧制，而非采用《明会典》等通行服制规范。其主要原因在于，清廷通过编撰前朝史书的契机，刻意修改或隐匿相关内容以突显自身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其中对前朝冠服制度的书写尤为关注。由于清廷对明代冠服制度的“选择性继承”，清初汉族遗民保留的明代服饰观念和形制与原初制度产生显著差异，并在清廷政策影响下逐渐演变为清代汉族婚俗的组成部分，最终导致后世对明清庶民婚服概念的混淆。

学者戴立强<sup>[39]</sup>在《明史·舆服志正误二十六例》中指出，《明史》与《明实录》在帝后、百官、命妇冠服记载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源于史料散佚、政治避讳或编纂者的知识局限。考察清初政策可见，皇室贵胄对民众沿用明制表现出强烈不满与抵制：一方面颁布“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的严厉措施<sup>[40-41]</sup>；另一方面，皇帝亲自质问道：“本朝何常无礼乐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是诚何心？”<sup>[42]</sup>

顺治时期，清廷采纳降清名臣金之俊“十从十

不从”的建议<sup>[43]</sup>，满汉衣冠之争宣告结束，汉族服饰文化的延续获得政策保障。该建议中的“男从女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官从而婚姻不从”3 条规范，确保了明代女性的着装、戏服及婚礼礼服在清代的传承。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服饰制度的演变并非简单照搬，而是融入了政治考量：清廷将明代贵族女性专属的风冠、霞帔下放为汉族庶民婚服，使这一服饰符号丧失了原有的等级属性。通过这种文化调适，清廷成功笼络了普通汉族民众的支持。

考察《续通典》《清稗类钞》的记载可见，清廷将汉族沿用明制婚服塑造为顺应民意、彰显皇恩的政策成果。例如：“风冠至国朝，汉族尚沿用之，无论品官士庶，其子弟结婚时，新妇必用风冠霞帔，以表明其正妻身份”<sup>[25]</sup>；“霞帔本为明代九品以上命妇之制……沿至本朝，汉族妇女仍以此为婚服重器，虽非朝廷特许，然仅限新婚及殓时使用”<sup>[25]</sup>。这种表述反映出清廷通过“政权合法性建构”重新定义婚服制度：一方面打破明代婚服等级限制，允许庶民使用风冠霞帔以满足汉族遗民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将满族冠服确立为官方标准，通过服饰符号的重构巩固政权权威。

### 4 结 语

明代庶民婚礼着装应为婿戴乌纱折上巾、着皂衫披红，妇戴髻髻并配金属花钗等头饰、着红色大袖礼衣（富贵者或僭越使用大红色）。品官婚礼用服与庶民着装仍存在显著差异：“假用”制度仅适用于品官子孙婚礼服饰，而非庶民阶层。部分文献中男性婚服“假用”九品服的记载实为概念混淆——男性婚服已超越常服形制，成为婚礼专用衣冠，实际构成明代庶民的“盛服”。

明代庶民婚礼服饰的模糊性，既源于明人典籍对婚服记载的简化，也与清廷为建构政权合法性而延续明代婚服形式密切相关。结合清初“十从十不从”政策与《续通典》《清稗类钞》记载，清廷将明代贵族专属的“风冠”“霞帔”下放为汉族庶民婚服，使这些服饰符号丧失了原有的等级属性。这种制度重构导致后人误认为明代存在婚服僭越现象，却忽视了明清婚服的本质差异。

#### 参考文献：

[1] 张春明, 李树霞. 1980—2023 年明代民间女服研究回顾与展望[J]. 服装学报, 2024, 9(6): 521-529.  
ZHANG Chunming, LI Shuxi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Ming Dynasty folk women's clothing from 1980 to 2023[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4, 9(6): 521-529. (in Chinese)

[ 2 ] 卞向阳, 李梦珂. 明代婚礼服饰的艺术特征与影响因素[J]. 服装学报, 2019, 4(6): 531-537.

BIAN Xiangyang, LI Mengke. Artistic featur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edding costumes in Ming Dynasty[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19, 4(6): 531-537. (in Chinese)

[ 3 ] 林琳. 中国传统婚礼服饰的发展趋势研究[D]. 北京: 北京服装学院, 2013.

[ 4 ] 朱曼. 论明代凤冠霞帔的定制与婚俗文化影响力[J]. 美术教育研究, 2013(9): 44-45.

ZHU Man. On the customization of Fengguan Xiaguan in Ming Dynasty and the cultural influence of marriage custom[J]. Art Education Research, 2013(9): 44-45. (in Chinese)

[ 5 ] 于佐君, 罗旭颖. 谈婚礼服文化的变迁[J]. 纺织导报, 2008(11): 92-93.

YU Zuojun, LUO Xuying. Talk on change of wedding dress culture[J]. China Textile Leader, 2008(11): 92-93. (in Chinese)

[ 6 ] 徐蓉. 明代婚礼服的审美特征研究[J]. 新美术, 2016, 37(1): 106-109, 133.

XU Rong. Study on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wedding dresses in Ming Dynasty[J]. New Arts, 2016, 37(1): 106-109, 133. (in Chinese)

[ 7 ] 贾琦, 涂慧敏. 市井文化影响下的明代江南女性服饰[J]. 服装学报, 2023, 8(4): 363-368.

JIA Qi, TU Huimin. Women's dress in Jiangnan of Ming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ivil culture[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3, 8(4): 363-368. (in Chinese)

[ 8 ] 白瑶瑶. 明代男子蟒衣的样式与演变——以明代肖像画为参考[J]. 艺术探索, 2024, 38(1): 14-21.

BAI Yaoyao. On the style and evolution of men's mang dress in the Ming Dynasty—based on visual evidence provided by portraits of Ming Dynasty[J]. Arts Exploration, 2024, 38(1): 14-21. (in Chinese)

[ 9 ] 董进. Q 版大明衣冠图志[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 10 ] 韩纯宇. 明代至现代汉族婚礼服 600 年变迁[D]. 北京: 北京服装学院, 2008.

[ 11 ] 郑巨欣. 中国服装色彩的文化共性[J]. 服装学报, 2025, 10(1): 59-63.

ZHENG Juxin. Cultural commonality of Chinese clothing colors[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5, 10(1): 59-63. (in Chinese)

[ 12 ] 牛犁, 张秋莹. 明代《汝水巾谱》所辑巾服特征与时代映射[J]. 丝绸, 2024, 61(10): 123-130.

NIU Li, ZHANG Qui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ra mapping of scarves in *Ru Shui Jin Pu* of the Ming Dynasty[J]. Journal of Silk, 2024, 61(10): 123-130. (in Chinese)

[ 13 ] 申时行. 明会典: 万历朝重修本[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4 ] 徐一夔. 大明集礼: 卷二十八·嘉礼十二[M].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 明嘉靖间内府刊本.

[ 15 ]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6 ] 赵克生. 《大明集礼》的初修与刊布[J]. 史学史研究, 2004(3): 65-69.

ZHAO Kesheng. The first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Daming Jili*[J]. Journal of Historiography, 2004(3): 65-69. (in Chinese)

[ 17 ] 佚名. 明太祖实录: 卷八六[M]. 台北: 中研院史语所, 1962.

[ 18 ] 向辉. 消逝的细节: 嘉靖刻本《大明集礼》著者与版本考略[J]. 版本目录学研究, 2016(00): 241-260.

XIANG Hui. Details of the disappearance: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author and version of Jiajing engraved edition *Daming Jili*[J].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s, 2016(00): 241-260. (in Chinese)

[ 19 ] 黄明光. 明代科举制度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5.

[ 20 ] 叶楚炎. 大登科与小登科: 明清通俗小说中的订婚叙事[J].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 2017(1): 42-51.

YE Chuyan. Two types of succes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narratives concerning engagement in the popular fiction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J]. Journal of Ancient Chinese Fiction and Drama Studies, 2017(1): 42-51. (in Chinese)

[ 21 ] 张秋莹, 牛犁. 明代男子直摆的形制与结构[J]. 服装学报, 2024, 9(4): 316-323.

ZHANG Qiuying, NIU Li.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men's straight pendulum in Ming Dynasty[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4, 9(4): 316-323. (in Chinese)

[ 22 ] 范金民. 《姑苏繁华图》: 清代苏州城市文化繁荣的写照[J]. 江海学刊, 2003(5): 153-159.

FAN Jinmin. Gusu Fanhua Tu: a portrayal of suzhou's urban cultural prosperity in the Qing Dynasty[J].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2003(5): 153-159. (in Chinese)

[ 23 ] 王夫之. 船山遗书[M]. 北京: 中国书店, 2016.

[ 24 ] 嵇璜, 刘墉. 续通典[M]. 影印本.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 25 ] 徐珂. 清稗类钞: 第 3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26 ] 陈柏宇, 田野. 《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中的明代百姓家具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3, 30(3): 7-11.

CHEN Baiyu, TIAN Ye. The study of Ming Dynasty common people's furniture in the supplement to *Lei Gong's Processing Drugs Browse*[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2023, 30(3): 7-11. (in Chinese)

[ 27 ] 李昕. 明代后妃凤冠制度钩考[J]. 服装设计师, 2023(4): 41-45.

LI Xin. A study on the phoenix coronet system of the imperial concubine in Ming Dynasty[J]. Fashion China, 2023(4): 41-45. (in Chinese)

[ 28 ] 扬之水. 中国古代金银首饰[M].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4.

[ 29 ] 周锡保. 中国古代服饰史[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 30 ] 西周生. 醒世姻缘传[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31 ] 仇泰格. 明代金银首饰研究[D].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4.

[ 32 ] 梁曼容, 李响涵. 浅析明代皇室礼服的因革[J]. 服装学报, 2023, 8(3): 235-241.

LIANG Manrong, LI Yunhan. Analysi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oyal dress in Ming Dynasty[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3, 8(3): 235-241. (in Chinese)

[ 33 ] 李林甫. 唐六典[M]. 陈仲夫,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34 ] 扬眉剑舞. 从花树冠到凤冠——隋唐至明代后妃命妇冠饰源流考[J]. 艺术设计研究, 2017(1): 20-28.

YANG Meijianwu. The flower tree coronet and phoenix coronet—research on the coronet of court women in Sui to Ming Dynasties[J]. Art and Design Research, 2017(1): 20-28. (in Chinese)

[ 35 ] 易延坤. 文化社会学视域下明代家具的东方理性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3, 30(6): 38-42.

YI Yankun. Eastern rationality of Ming Dynasty furniture in the cultur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2023, 30(6): 38-42. (in Chinese)

- [36] 周汛, 高春明.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6.
- [37] 赵丰. 大衫与霞帔[J]. 文物, 2005(2): 75-85.  
ZHAO Feng. Dasha and xapei[J]. Cultural Relics, 2005(2): 75-85. (in Chinese)
- [38]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 [39] 戴立强. 《明史·舆服志》正误二十六例[J]. 辽海文物学刊, 1997(1): 87-94.  
DAI Liqiang. Twenty-six rectifications of errors in the treatise on carriages and Costumes from the History of Ming[J]. Liao Hai Journal of Cultural Relics, 1997(1): (in Chinese)
- [40] 佚名. 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 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41] 郭艳. 清代髦衣设计元素的提取及其在现代皮革服饰中的应用[J]. 皮革科学与工程, 2024, 34(3): 108-113, 124.  
GUO Yan. Extraction of the design elements of the cloak in Qing Dynasty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modern leather clothing[J]. Leath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4, 34(3): 108-113, 124. (in Chinese)
- [42] 陈具庆. 多尔衮摄政日记[M]. 北京: 故宫博物院, 1933.
- [43] 天峨. 清朝外史[M]. 台北: 文桥书局, 1972.
- (责任编辑: 卢杰)

# 基于问题意识的“以物证史”设计学研究范式

## ——评《时新衣著: 民国汉族传统女装结构演变的规律及特色实证》

孙捷

(东华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 201620)

王志成、崔荣荣合著《时新衣著: 民国汉族传统女装结构演变的规律及特色实证》, 立足设计学, 通过整理大量一手传世实物史料, 结合“新物首证”“旧物新证”, 从结构设计的维度对民国汉族传统女装的衣型、袍型、裙型、裤型、领型进行了系统实证, 在研究资料、方法和观点上进一步丰富了已有的近代设计史、时尚史研究。

作者十分强调“以物证史”, 关注实证研究的重要性。目前, 关于民国传统女装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该书最大的创新点便是新视野和新材料。在设计学视域下, 将服饰作为器物(物质)、视觉、形式等符号能指, 或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年)所称“真实服饰”的角度进行考察与研究, 是构建艺术设计知识体系的核心路径。该书针对女装结构设计演变, 一方面重点聚焦未被学术界系统梳理的博物馆馆藏标本, 另一方面对既有研究存在认知偏差的传世实物进行再证。具体而言, 作者对广州市博物馆、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馆藏大量未被整理研究的民国女装实物展开形态学分析, 基于这些新材料考证其中女装结构改制现象、形制结构过渡现象等。针对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等已被考察过的典型实物, 作者则通过数据测量与结构复原, 结合民国时期文献史料记载, 提出女装领型结构变革等新观点, 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修正和丰富。

设计的本质是解决问题, 无论是当下的创新设计, 还是过去的设计史研究, 概莫能外。该书研究过程处处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作为一部篇幅宏大的著作, 作者并未简单罗列史实, 而是基于已有研究, 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逻辑, 不断拓展、延伸并深化研究空间。如在研究民国后期改良常服绿棉收腰长袖女袄时, 作者敏锐发现该服饰有两处接袖, 通过对其结构测绘与复原实验, 推测出“客观面料幅宽限制”和“主观节省面料需求”两种设计动机。本书问题意识不仅表现在对服饰设计要素和过程的探讨, 还体现在对服饰之外的社会性考察, 以及对民国传统女装发生结构演变的社会动因的深入解读。所谓通过现象看本质, 设计在本质上是对当下社会与生活问题的反馈及解决措施。

人们往往通过优化、改良、创新等不同程度的设计, 来便捷化、舒适化和美化日常生活。从这个角度看, 民国时期传统汉族女装结构发生的大量改良和优化设计, 均是出于对当时社会变革与生活变迁的回应。例如, 当时女性生活场景、社交范围以及职业发展等的变化, 对下裳女裙的结构设计提出了新的功能需求。为了解决部分“定型筒裙”裙摆围度骤减带来的下肢活动不便问题, 作者发现时人通过筒裙侧身褶裥的“显隐”设计, 在保持筒裙基本廓型不变的前提下, 增加了裙摆的围度, 不仅使裙身穿着后更富层次感, 而且通过增加裙摆活动量实现了“裙内空间”的创新营造。

服装作为“衣食住行”之首, 在功能上可以满足人们身体防护、日常出行以及社交活动等多维度的物质需求, 在审美和文化上又能承载人们对于自然、社会、人文等价值内涵的精神追求。该书的研究和出版, 生动呈现了基于问题意识的“以物证史”设计学研究范式, 启示设计研究和实践者更多地关注设计作为“物”对“人”的适用性和美化作用, 思考设计对“社会”的反馈与引领。(责任编辑: 卢杰)